



浅谈唐廷枢的爱国情怀

□ 王砚红

唐廷枢（1832—1892年），广东香山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人，著名的企业家、实业家、慈善家，中国近代实业强国和近代工业化先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给唐廷枢致悼词时评价：“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唐廷枢。”唐廷枢一生共创办工商企业40多家，涉及轮船运输、煤矿、铁路、水泥、保险、教育、慈善等多个领域，创造了多个中国近代工业第一，初步建立了中国早期工业体系和唐山市城市基础设施，为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及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作出了突出贡献。唐廷枢的爱国情怀及开拓创新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鲜活的时代价值。

唐廷枢与唐山结缘于1876年。中国近代工业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而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虽然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运动，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有爱国的表现。当时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认识到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于1876年委派唐廷枢到滦州开平镇勘察并筹建煤矿矿。自此唐廷枢开始了在唐山的一系列创新创业：1878年在唐山创建的开

平矿务局，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1881年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后搬迁至唐山矿西侧改名为唐山修车厂）是中国第一家机车修理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1889年开平矿务局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是中国第一个水泥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桶水泥……可以说，唐廷枢是唐山近代工矿交通业的开拓者，初步架构了唐山近代工业体系的雏形，有力促进了唐山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为此，唐廷枢曾被研究者誉为“唐山之父”。

唐廷枢在唐山及其他地方所做的一切都源于其强烈的爱国情怀。1884年，唐廷枢在为《瀛海采问》一书作序时写道：“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这是唐廷枢的爱国情怀，也是其后半生的不懈追求。40岁之前，唐廷枢主要为外国人打工，他是上海滩著名的“洋买办”、华商领袖。在距他去世90年后的1982年，怡和洋行出版纪念开办175周年的特刊中称唐廷枢“既爱国，又有世界眼光”，可以看出其

爱国行为给洋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在外籍轮船上看到中国乘客不如羊获得的淡水多而受到侮辱与刺激，感到自己再富足、在洋行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寄人篱下，国民的地位由国家强弱决定。虽然唐廷枢人在洋行，但心还是中国心，看到洋人对中国财富的抢掠，内心受到冲击，很想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倾尽绵薄之力，促使其摆脱任人宰割的地位。40岁之后，唐廷枢便离开怡和洋行并投身李鸿章主导的洋务事业中。在唐山的16年，是其一生投入精力最多且对民族工业影响最大的时期。唐廷枢立志主张“仿西技、用西人”，创办实业实现“自强”和“求富”。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在与洋人打交道、处理涉外纠纷时，例如协助李鸿章妥善处理“马嘉里”案和“吴淞铁路”案、受丁日昌委派处理“福厦电线”案，他都能够时时维护国家尊严、处处保护国家利益；他深知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对国家办洋务的重要性，编写了中国第一本英语词典和教科书，支持

并资助容闳选拔第一批留美学生，把自己创办的企业作为培养洋务人才的基地，明确规定所聘用的洋人必须向中国人传授技术；他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创办代表民族利益的《汇报》，资助普育堂和辅元堂等慈善机构、赈济山西和河北等地饥荒。

唐廷枢既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在其强烈的爱国情怀激励下，他充分发挥了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和经营管理能力，围绕实业救国目标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务实开放，他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贡献多多。特别值得敬佩的是唐廷枢去世后竟然没有留下家产，其葬礼的花销靠友人赞助，其友人曾在《申报》追思“惟公负坚忍不拔之志，存至公无我之心，不畏难，不贪利，用能再蹶再振，卒告成功。”至公无我，多么高的境界和胸怀。在敬佩之余，我们也要铭记历史、赓续血脉、开创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希望企业家增强爱国情

怀，对国家、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更大的发展。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儿女心中。爱国敬业是企业家的精神灵魂，是近代以来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不同时代企业家的爱国情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爱国是一个永不衰竭的话题，爱国情怀是企业家奋力前进的风帆。唐山的企业家更应该从唐廷枢身上感受到爱国情怀与伟大成就之间的密切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增强爱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勇于开拓创新，担当社会责任，坚持守法经营；唐山的企业家更应该爱国敬业、奋勇争先，力争为“三个努力建成”“三个走在前列”作出更大贡献。

湟水唐溪不了情

□刘士裕



2018年底，我准备把新出版的《风华年轮·唐山籍书画名家写真》寄给远在青海的林锡纯先生，但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无奈翻到林嫂郑美霞女士电话，却收到一个噩耗，说先生患心脏病，终因心力衰竭，已于2017年12月9日过世。听到一半，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

记得两年前，为编辑《风华年轮》一书，我向锡纯兄索要照片，他说还是选其他更有成就的书画家吧。林嫂告诉我，当时他已病重，谢客居家疗养。我真后悔不该这个时候打扰他。

屈指算来，我和锡林兄初次通信该是2005年10月，他当时还在青海省书协主席任上。听闻家乡要举办唐山籍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展，特意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创作成四条屏寄了过来，令我十分感动。

然而，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却费了一番周折。2007年，我提出要对他做一次专访，被婉言谢绝。他说：“我当书协主席有‘约法三章’：一是不出自己的集子，二是不搞个人展览，三是不接受媒体采访。我只有这样，才能处事公平。”他说话不紧不慢，但语气坚定，说得也在理，我只得另寻机会。时隔5年，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先是犹豫了一下，但碍于老乡情面，还是答应下来：“那你就过来吧，也好来青海看一看。”

2012年5月31日，我从唐溪（陡河古称，唐山母亲河）畔出发，从北京坐上飞往西宁的飞机。待机舱静下来，我捋了一下近几天做的功课：锡纯兄1935年出生于唐山果园乡李家套村。195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时，因思想纯真吐了些“真言”，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孰料，他直面人生，在逆境中竟成就为一代教育家、著名报人、杂文家、书法家，被誉为“河湟（黄河和湟水的并称）一支笔”。说来也巧，一下飞机，便买到一份《西海都市报》。上面刊有“青海省有突出贡献老文艺家评选表彰人员名单”，锡纯兄赫然名列其中。我真为这位乡兄骄傲。

6月1日，访谈安排在西宁城郊一处庄园里。锡纯兄精神矍铄，腰板挺直，年届望八的老人，仍保持着英武儒雅的文人气质。不愧是教师和编辑出身，追忆过往，倾诉情感，条分缕析，有板有眼。他讲自己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只是以谦恭之心对待每项工作。对于“现实版”“比电影《牧马人》还牧马人”的坎坷经历，他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倒是对在家乡生活的情景不吝笔墨，侃侃而谈。

锡纯兄很重情感，对曾给予他帮助的人，总是没齿不忘。他上初中时担任过学校画社社长，毕业待分配时，唐山劳动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大远先生突然把他约去，说：“美术编辑另有任务，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到报社工作，当美术编辑。你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我都看了，相信你能胜任。”后来因学校领导坚持要他留校继续上高中而没能去成，但一谈起大远先生的知遇之恩，他两眼总是闪烁着感激的目光。

中学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锡纯兄说他最难忘的是老师对他的教育和培养。至今虽已60多年，但对老师宣道平、果树邨、刘霭杰、候菊潭、林惠中、张甫瑞、赵向华、李向夫……仍能一口气叫出名字，而且对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

访谈时，锡纯兄提到了其中的两位。

一位是对他影响最深的美术老师宣道平。他讲了一件令他深感内疚的往事：“宣老师把我当知心人，无

话不说。一次他跟我发牢骚，对不重视基本功训练等情况表示不满。他的意见很中肯，而我却认为是‘落后言论’，向教导处副主任做了汇报。过后我心里总觉不安，见到宣老师，生怕两人目光相遇。一天，宣老师喊住我，说‘你做得对，应该向领导汇报。’他的语气还是那样平和，丝毫没有埋怨。但我却觉得没脸再见的宣老师。”直到1962年，他才给宣老师写了一封问候信，老师很快回信说：“分别8年了，一位身着丹色小衫的天真烂漫的少年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何时再相见，不得而知。”同时寄来两幅画，题款是“锡纯老弟补壁”。唐山地震后，得知宣老师半身瘫痪，他想再给老师写一封信，但百感交集，却不知如何下笔。锡纯兄动情地说：“直到宣老师离开人世我才真正了解他，才真正懂得他题词‘学问深时意气平’的真正含义。”

另一位是改变他人人生轨迹的语文老师张甫瑞。当年张老师看他是一棵好苗子，就在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的学习上给他“吃偏饭”，于是他的兴趣就由美术逐渐转向了文学。而锡纯兄也不负老师期望，毕业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4年，每逢假期，他都要到老师家当面求教。到青海后，仍坚持书信往来。一次张老师看了他发表的作品后回信说：“你写的东西不善于细致地记述和生动地描写，但语言比较准确、精炼，而且时发奇思异想，所以最好向杂文、小品文方面发展。”张老师还曾在信中批评他的一篇杂文“有句无篇”，即从局部看确有些独到见解，但从整体看则显得松散平淡，找不到一处最醒目的地方。每次张老师都能切中要害，及时指出努力方向。锡纯兄说：“我在诗歌、杂文、小品文上取得的成就，就有张老师付出的心血。”

这次访谈后，我们只联系过一次，那已经是2011年的事了。当时

在编辑《历代名人咏唐山·当代书画名家手墨》，我从中遴选了乾隆帝《偏凉汀即景》诗二首，抄后请他书写。不久便接到他的电话，告知有三处不合诗的韵律，请查一下。经同原件对照，果真发现均为抄写错误所致。锡纯兄多年深耕诗坛，佳作不断，其中多篇作品上过诗刊，并被收入《中国当代诗词选》和《五四以来诗词选》，此事足见其功力深厚。

在西宁临别时，我和锡纯兄曾约定，在他方便时，同林嫂一起，带着孩子回老家唐山看一看。这何尝不是他的夙愿。为排解胸中燃烧不息的乡愁，他常在书法作品后署“燕山生西海客”“湟水之滨浥阳锡纯”（浥阳为丰润

区旧称，其出生地果园乡在解放初期隶属丰润）。锡纯兄亦有一枚闲章“湟水西流”，自言常借“西流湟水自还乡”古诗句，含泪回望几千里外的唐山故土。记得有人谈起和他一起来青海的，像朱乃正、王复羊等朋友，平反后都回到了大城市。锡纯兄只是淡淡地一笑：“我这个人随遇而安。我的事业在西宁，朋友圈在西宁，在这里待惯了，到大城市反倒觉着不适应。”这正应了唐人黄峭的两句诗：“年深外境犹吾景，日久他乡即故乡。”一生漂泊的游子，已经把他的生命融入河湟大地，但他坦荡的内心深处，又何曾须臾忘记养育过他的唐溪、唐山，还有故乡的老师、同学、父老乡亲……



风俗乡情——

张马尾罗

□ 于东兴

早年间，农家所用的粗罗细罗，因其罗底是用马尾巴上的长鬃编织的，所以又叫“马尾罗”，把罗底固定在罗帮上，叫“张罗”，乡间将“张罗”与修理罗子簸箕的匠人，都叫“张马尾罗的”或“张罗的”。后来，罗底改用铜丝网子，不用马尾了，人们还叫他们张马尾罗的。意为招待、照应、料理、筹划的“张罗”一词，大抵由此而来吧。

张罗师傅大多推个独轮车，走街串巷，车上放着工具箱和材料。工具箱里装着篾刀、小锯、小凿、小钻之类的工具；材料主要是竹批、藤条和圈成圆圈的薄木片，还有一些罗帮，编了一部分的簸箕之类半成品。

张马尾罗这一行当的“唤头”，是用铁丝或牛皮条串成一串的铁叶子，其长尺许，有十几片。甩响唤头，是这一行当的功夫——像打竹板一样，用手将铁叶子前推后甩，那些铁叶子便一片片相互撞击，发出“哗啦啦”的声响。那种金属撞击声，近听如狂风突至，暴雨骤降，稍远又像轻轻拍打礁石的海浪，“哗——哗”，一浪一浪推涌过来。张罗师傅甩动铁叶子，常变换手法，在一阵连绵的“哗哗哗”的声响后，有时突然来一个单音节的重响，然后戛然止住，还在颤动的铁叶子霎时就垂下来，静止不动。这时，那海浪一般的“哗哗”声，便退潮一样渐渐隐去。突然间，张马尾罗的手一扬，铁叶子又急促地来回碰撞，那哗哗的声响又排山倒海般震荡起来……

当那海浪一般的响声还在村庄回荡的时候，张罗师傅已坐在马扎上，做起活来了。或是用柳木片做个罗帮，或是用特殊的铁刀把竹子剖成细条，为竹筛备料。来了主顾就放下手中的活计，接过那些破损的罗子、簸箕，讲好价钱后，就专心致志地修理起来。主要是补罗帮、换罗底，紧固松散散脱的簸箕边，或是换簸箕舌头。许多人家的罗底都是用得大窟窿小眼子的，用线缝了又缝，实在不能将就时，才换新罗底。簸箕舌头也是磨去大半且多有裂开时，才换个新的。罗帮破损一块，补上一块新柳片，钉好，磨平即可。换罗底也不费事，这一行最具“技术含量”的是换簸箕舌头。

只见张罗师傅将卷为筒状的柳木片展开一段，量好尺寸，一刀便刷地割下，手头精准，毫不拖泥带水。待拆下旧舌头后，将它缝上去，再用刀割平刮齐，一个新簸箕舌头就安好了。

张罗师傅成年累月劈竹、编织、修补，手像树枝一样粗糙，手指、手掌到处是被竹片刮伤的痕迹，冬日里更是沟壑纵横，露出血筋。

说起乡村张马尾罗的，我总是想起自己一段特殊的经历。那是多年以前，我在一所遥远的山城中学实习，我们几个男生住在一个大宿舍里。一天凌晨，尚未起床，正自朦胧间，忽觉床板抖颤，灰土打脸，猛然意识到发生地震了。是谁发一声喊：“地震了！”随着喊声大家一个接一个狼狈跑出。到外面，晃动已然停止，天地间一片安静，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大家惊魂稍定，方踱进宿舍寻鞋觅衣。开灯一看，床上、地上落下厚厚一层房土。这天一整天，我们与师生一道上山扛来松杆子，在操场搭建防震棚。

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学校食堂吃饭，又是一阵地动房摇。人们慌忙跑到外面四下张望，见伙房大灶上的烟囱正晃来晃去。在烟囱摇摇欲倒的同时，屋顶上万千瓦片，也全都跳动起来，上下扇动，“哗啦啦——哗啦啦”响成一片，惊心动魄。我望着上下狂舞的瓦片，忽然想到家乡“张马尾罗”的，边走边摇动那一串铁叶子，一路哗哗作响的情景。

那是1966年3月8日，后来得知，这天河北邢台发生了地震。平山县城距震中三百余里，震感尚如此强烈。